

陶里亞蒂與意大利共黨路線

熊自健

一、薩連諾的轉向 (Svolta di Salerno)

一九四三年六月史大林解散第三國際。意大利共產黨（以下簡稱意共）總書記陶里亞蒂（P. Togliatti）在莫斯科簽署了解散第三國際的宣言。第三國際解散之後，陶里亞蒂仍舊留在莫斯科指導意共反法西斯的抵抗運動。一九四三年七月英美聯軍登陸意大利西西里島，八日攻克西西里。於是當時成立的意大利巴多里奧（Badoglio）政府，於一九四三年九月與同盟國簽署一項休戰協定。此後，在意大利境內，一切反法西斯的政黨可以公開活動，同時在意大利各個角落活躍著反法西斯的聯合委員會。意共也就從地下轉到地上，在南意大利積極的進行活動。一九四三年十月巴多里奧政府向德國納粹宣戰；意大利分裂為二，北方為德軍佔領與法西斯羽黨的統治，南方為同盟國的政府。意共在北方的抵抗法西斯運動中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其領導人隆哥（L. Longo）會形容意共此時在北方的政治地位是「雙重政權」（duality of power），亦即在北意大利，地上是德軍與法西斯進行統治，地下則是意共領導的反法西斯執行委員會享有威望^①。接受布爾什維化後的意共，在這種歷史條件之下，自然會吸取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後的革命經驗，企圖實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然而史大林却從現實政治的利害考慮到：英美聯軍正佔領南意大利，他們支持巴多里奧政府，意共所領導的游擊隊能戰勝英美聯軍嗎？更重要的是此時蘇聯仍舊需要美援，千萬不可觸怒英美聯軍。於是蘇聯與英美共同在一九四三年十月承認巴多里奧政府，但是蘇聯同時爭取到意共參與巴多里奧政府之內，希望意共能在一個有利的時機中，奪取政權^②。而一九四四年一月底，南意大利的社會黨、行動黨（Action Party）與共產黨却共同發動攻擊巴多里奧政府，要求廢止君主制，成立制憲會議，統一全國。在這般錯綜複雜的政治情勢下，陶里亞蒂於一九四四年三月底返回了離開十八年的祖國。

註① See F. Claudi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From Comintern to Cominform*, (Penguin Books 1975), p. 347.
註② *Ibid.*, pp. 351-52.

一九四四年四月陶里亞蒂在拿波里(Naples)的薩連諾(Salerno)發表公開演講，說明「意共的全國統一政策」(The Communist Policy of National Unity)，號召所有的意大利人共同為反法西斯而奮鬥，移轉了當時意大利應走君主立憲或民主共和的熱烈辯論。陶里亞蒂在演講中聲明支持巴多里奧政府，直到全國統一後再組立憲會議來決定意大利未來的政體與國體；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推翻法西斯政權，進行統一全國的使命。同時陶里亞蒂也希望把意共轉變為一個羣衆政黨，以民主的道路奪取政權。陶里亞蒂費盡心力向意共黨員說明路線轉變的理由，終於獲得大部份意共黨員的支持，形成了意共黨史上著名的「薩連諾的轉向」。總結陶里亞蒂新路線的基本方向如下：

(一) 譴責法西斯的罪行，根除法西斯主義。陶里亞蒂指出法西斯曾攻擊意共為：(1) 財產的敵人，(2) 支持暴力，(3) 破壞家庭制度，(4) 失敗主義者，(5) 民族的罪人。陶里亞蒂一一提出反駁，以法西斯二十年殘暴的統治來證明這些罪名恰好可以反套在法西斯的頭上，所以法西斯才是真正財產的敵人、暴力的支持者、家庭制度的破壞者、失敗主義者與民族的罪人。陶里亞蒂又說：「目前意大利還有一半的領土在德軍的佔領之下，還有半數以上的同胞在法西斯的蹂躪之中；我們應該動員一切的力量來解救那些在恐怖與野蠻生活中的同胞們，光復國土，完成統一」^③。

(二) 關於意大利的統一、自由與獨立的問題。陶里亞蒂認為應當暫時把君主制與國王的問題擺到一邊去。目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務是開創出一個有力量的「戰時政府」，儘快的推倒法西斯，驅逐德軍。只要巴多里奧政府是在積極的進行全國統一，意共就支持它。陶里亞蒂也提出一個「民主的戰時政府」的構想。他認為組成一個「民主的戰時政府」有下列三個條件：(1) 這個新政府不能破壞反法西斯力量的結合，不能破壞自由與民主力量的結合，只許增進反法西斯的力量與擴大自由與民主的力量。(2) 這個新政府必須保障意大利人民的自由，必須以秘密、直接與普遍的選舉方式在全國公民中選出「全國制憲會議」，來決定意大利未來的政體與國體。(3) 這個新政府必須建立在羣衆政黨的基礎上，必須有一個明確的「戰時綱領」，而且盡全力來實現這個綱領^④。此外，陶里亞蒂對於當前的政治任務提出四點具體的建議：(1) 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加入同盟國，共同為保衛民主作戰；(2) 建立一個專門的機構，解決當前的饑民問題；(3) 全力整肅法西斯的特務組織，以保障人民的自由與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4) 在光復領土內實行民主的地方自治^⑤。最後陶里亞蒂號召全意大利人民共同為反法西斯而奮鬥，向蘇聯學習反法西斯的經驗，向蘇聯看齊與致敬^⑥！

註③ P. Togliatti "The Communist Policy of National Unity", Tr. English by D. Bootman, in D. Sassoon, ed. *Togliatti On Gramsci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9) pp. 33-37.

註④ *Ibid.*, pp. 46-50.

註⑤ *Ibid.*, pp. 54-56.

註⑥ *Ibid.*, p. 57.

(三)改革意共，使其成爲羣衆政黨，走羣衆路線，以民主的道路通往社會主義。陶里亞蒂指出在法西斯廿年的專政中，羣衆只聽到謊言，而被孤立於現代的思潮與行動之外。同時法西斯排除公開競爭的政治參與，切斷了意識形態的爭辯，麻痺了人民的生活。由於法西斯起自意大利民主政治的不成熟，致使民主政治遭到全面的破壞。如今要打倒法西斯，首要工作是恢復民主，讓羣衆能够公開的自由的說話、討論問題、參與政治。因此意共必須順着此一歷史潮流轉變爲羣衆黨，發展羣衆路線，公開的進行宣傳與組織活動。此外，意共必須着手建立統一戰線，組織「反法西斯民主同盟」，聯合社會主義者、天主教徒、農民羣衆，來共同推翻法西斯，根除法西斯主義^⑧。陶里亞蒂亦鼓勵意共參與政府，積極推動地方自治。至於處理別人嘲笑意共不再是革命政黨、不再推行革命運動的言論，陶里亞蒂認爲最好是置之不理；因爲對意大利人民而言，最革命性的事業就是把全國的同胞從外國佔領與法西斯統治中解救出來^⑨。

陶里亞蒂這篇著名的演講打動了許多人的心，許多年輕的意大利人支持陶里亞蒂的新路線，成爲意共的新血，幫助陶里亞蒂把意共轉變爲羣衆政黨。例如：當今意共影子內閣主管經濟事務的納波利塔諾(G. Napolitano)就曾高度的評價陶里亞蒂新路線對自由與民主的尊重，主張追隨陶里亞蒂所謂「進步的民主」(Progressive Democracy)^⑩。

美國MIT政治學教授布雷克默(D. L. M. Blackmer)分析陶里亞蒂採取新路線的主要原因有：(1)脫離孤立。意共在法西斯廿年的迫害下，精英份子喪失殆盡，爲了扭轉此一劣勢，陶里亞蒂被迫轉向羣衆路線，以脫離孤立的危險，爭取羣衆的支持，開創有利的政治氣候。(2)預防法西斯的回轉。陶里亞蒂認爲法西斯是一個羣衆支持的政治運動，不只是一個政黨的專政。因此，對抗法西斯專政也就必須喚起羣衆參與民主政治的熱情，尊重自由與民主的價值，同時也必須聯合天主教徒，社會主義者共同進行反法西斯的鬭爭。(3)創立意共新形像。陶里亞蒂認爲社會主義不是一天可以達成的，必須經過長時期的過渡。因此必須在這個有利的歷史轉捩點上建立意共的新形像——以民主的道路通往社會主義。陶里亞蒂建議以普選的方式選出「全國制憲會議」來決定意大利的未來，他也支持宗教自由政策，允許基督教徒與馬克思主義者對話。這些都是爲意共建立新的形像^⑪。布雷克默教授也指出陶里亞蒂之所以能順利的推展他的新路線是因爲意共多年來參與抵抗法西斯運動的結果，因爲意共參與抵抗法西斯運動，

註⑧ *Ibid.*, pp. 31-32.

註⑨ *Ibid.*, pp. 50-51.

註⑩ *The Italian Road to Socialism: An Interview by E. Hobsbawm with G. Napolitano*, Tr. English by J. Commet. (London: Lawrence Hill & Company, 1977). pp. 6-7.

註⑪ D. L. M. Blackmer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Postwar Italian Communism" in D. L. M. Blackmer, ed. *Communism in Italy and Fra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26-33.

增進了政治聯盟的資本，享有羣衆性的威望，獲得蘇聯的支持。因此陶里亞蒂能够在「統一全國」、「進步的民主」的口號之下，順利的推展他的新路線^①。

前意共黨員、著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柯雷蒂(L. Colletti)則認爲陶里亞蒂的新路線基本上是第三國際七大「人民戰線」的延續。陶里亞蒂能够隨心所欲的轉變路線，是因他背後有史大林的支持；同時他所謂的民主，指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它遲早要被社會主義所取代。因此，陶里亞蒂的新路線非常清楚明白，具有說服力，而不受到蘇聯的懷疑與意共黨員的非難^②。前西班牙共產黨政治局委員克勞汀(F. Claudin)更清楚的說：陶里亞蒂的新路線實際上是忠實的執行史大林的既定方針。史大林希望陶里亞蒂能改組巴多里奧政府，以竊取勝利的果實，而不傷害蘇聯與英美的關係。由於陶里亞蒂不能成功的通過民主的道路以獲取政權，導致他在共產情報局成立時遭受蘇聯的批判^③。

一九四四年七月英美聯軍攻克羅馬，陶里亞蒂於十月在佛羅倫斯(Florence)演講：「在當前的局勢中，我們政黨的任務」(The Task of Party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陶里亞蒂重申新路線的意義，並且進一步提出在下列四方面改革黨的結構：(1)權力下放，地方有權決定政策；(2)基層組織的細胞不宜太多太大；(3)建立支黨部在城鄉的政治權威，成爲地方自治與政治生活的中心；(4)吸收新血，歡迎曾受法西斯騙過而後又覺悟的青年入黨，歡迎曾受法西斯壓迫下不得不接受法西斯指使的工人入黨。而且青年同志必須受到一定的尊重^④。此外陶里亞蒂強調必須落實「聯盟政策」；建立一個由社會主義者、天主教徒與共產主義者的新工會(CGIL)；必須努力實現葛蘭西(A. Gramsci)的工農聯盟政策；也必須加強與社會黨、基督教民主黨、解放運動委員會建立更好的關係^⑤。陶里亞蒂下定決心走羣衆政黨的路線。

經過二年的努力，當意大利一九四六年全國大選時，意共獲得一八·九%的選票，擁有黨員一百七十萬人。意共位居第三大黨，名列基督教民主黨(DC)、社會黨之後。陶里亞蒂檢討這次大選的挫敗是由於意共在「全國統一」的總路線下，並沒有清楚的區分他們與基督教民主黨、社會黨的不同之處。同時基督教民主黨亦打着社會改革的旗幟，吸取了許多支持左派的人士^⑥。在大選中獲勝的基督教民主黨逐步的清除意共參與政府的人士。隨着國際冷戰的發展，意共自一九四七年起被排出政府部門

註① *Ibid.*, p. 25.

註② L. Colletti, "The Three Faces of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Telos*, No. 42, 1979-80 Winter, pp. 117-118.

註③ F. Claudin, *op. cit.*, 351-52.

註④ P. Togliatti "The Task of the Party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D. Sassoon, ed. *op. cit.*, pp. 91-93.

註⑤ *Ibid.*, pp. 79-84.

註⑥ F. Claudin, *op. cit.*, p. 366.

，成爲在野黨。同時在冷戰期間，蘇聯領導階層給予意共更大的壓力，要求意共隨莫斯科的調子跳舞。陶里亞蒂盡可能的維持一個現實主義的內政方針，並且避免與蘇聯尖銳的衝突，在外交上常常追隨蘇聯的政策。例如：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共產情報局在布達佩斯舉行第二次會議，陶里亞蒂在會中提出需要一個廣泛的聯合政策，但是他也宣稱意大利共產主義者將追隨「蘇聯偉大的範例」，他提出以一個「革命的警戒」來反對所謂「狄托的間諜隊伍」，並且補充說：所有的異端份子必須無情的加以消滅^⑥。直到史大林於一九五三年逝世之後，陶里亞蒂才開始更進一步的改革意共。一九五六年蘇共廿屆大會，陶里亞蒂終於獲得機會來介紹「以意大利的道路通往社會主義」這個概念，進而把意共發展爲「歐共主義」的先行者。

總結陶里亞蒂從一九四四年「薩連諾的轉向」到一九五六年意共「八大」邁上獨立自主的道路止，他的新路線却造就了基督教民主黨的勝利，而使意共本身陷入在野黨。但是意共執行新路線的結果，也獲得了兩項有力量的武器：(1)根深蒂固的羣衆組織。意共走羣衆政黨路線的成果是大量的發展組織，掌握相當可觀的地方勢力。最爲成功的是意共主導工會的發展，通過工會來影響日益增多的工人。這條路線比基督教民主黨通過教會來影響羣衆更具威力。因此意共的政治力量得以持續成長，日益威脅基督教民主黨的政治優勢。(2)解決內部矛盾，增強意共的團結。「薩連諾的轉向」使意共黨內逐步放棄列寧主義通過「職業家革命黨」與「武裝暴動」的路線來獲取政權。陶里亞蒂長期疏導意共的黨員認清「以意大利的道路通往社會主義」，贏得黨內大多數同志的贊許，形成共識，成爲一個強有力的新型共黨。意共的新路線在發展出這兩項強有力的武器之後，更向前邁進，成爲「歐共主義」的先行者。

二、「歐共主義」的先行者

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召開「廿大」，會中赫魯曉夫進行貶史大林的秘密演說。同年三月陶里亞蒂從蘇聯歸來，宣稱：尋求「意大利的道路通往社會主義」已經成爲意大利共產主義者不斷努力的目標^⑦。五月底，陶里亞蒂赴貝爾格萊德會見狄托(Tito)，他是第一個歐洲共黨的領袖到貝爾格萊德學習南斯拉夫經驗。從南斯拉夫回國之後，他在六月底接受「新內容」(Nuovi argomenti)雜誌的訪問，發表談話，對於貶史大林問題，蘇聯的未來，國際共運的發展提出了獨到的見解，要點如下：

(一)貶史大林問題：陶里亞蒂拒絕了蘇聯貶史大林的理論。蘇聯把史大林的一切罪過都歸之於史大林的個人性格與個人崇拜，

註⑥ See W. Leonhard, *Eurocommunism: Challenge for East and West* tr. English by M. Vecchio, (New York: Holt, Rindhart and Winston 1979), p. 167.

註⑦ *Ibid.*, p. 168.

陶里亞蒂則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指出上層建築是適應於下層基礎的，因此史大林的錯誤與罪過必須由整個蘇維埃制度中去解釋。陶里亞蒂同意蘇聯譴責史大林整肅幹部鎮壓人民的方法，但認為史大林主義的形成是由於官僚化和說謊所促成的，遂致蘇聯失去了創造力、不認真的討論問題，解決矛盾。蘇共「廿大」所揭露的各種錯誤是長期的缺乏民主與法治所造成的，因此蘇共領導階層必須集體的擔負這個責任。由於史大林對共產黨員的政治人格、政治生活等各方面有深刻的影響，同時他對人民的精神加上鎖鏈，因此貶史大林崇拜可以恢復民主作風，發展個人創造能力，尋求出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方向。但是蘇聯不容易克服這個問題，因為蘇聯社會長期在史大林的崇拜下生活，人民的批評、創造、行動的能力幾乎喪失殆盡^{①9}。

(二)蘇聯進行改革體制的問題：陶里亞蒂明白的指出蘇聯不容易改革其體制。因為蘇維埃制度是蘇聯人民自己創造出來的制度，它的權力來自革命。蘇維埃制度有兩大特點：(1)它使政治的生活穿透社會各個階層，它從最基本的工作單位開始，一步步的上升至城鎮、省市，以至於全國性的蘇維埃。(2)它使政治的生活與生產活動相聯繫，克服以往政治與經濟分離的民主制。但是，蘇聯當局本身制止了蘇維埃制度的發展。蘇共廿大公開承認了蘇聯當局限制了人民的民主生活，官僚化與權威性的領導統御干涉了蘇聯人民的民主生活。陶里亞蒂還進一步的指出蘇聯不可能發展為多黨制。其原因：(1)社會主義是一個同質性的社會，並沒有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因而不易形成多黨；(2)蘇聯共產黨以發展社會主義為職志，在這個大目標下，蘇共黨內的反對意見可以在行動這個層次上解決其矛盾，不至於發生多黨相互競賽的局面。此外，陶里亞蒂還指出蘇聯把經濟權力下放具有較深刻的意義，它是蘇聯民主化的第一步。至於所謂司法獨立是無用的，因為它不能治療違法的活動；要真正的保障人權，只有全社會各個層面都進行民主化。最後陶里亞蒂總結一句話：蘇聯不可能走回頭路，打破現存的體制，回到以往的制度^{②0}。

(三)國際共運的問題：陶里亞蒂認為貶史大林對國際共運有四點影響：(1)蘇聯進行貶史大林這種自我批評的作風，是繼承共產黨黨風的優良傳統。檢討錯誤，策勵將來對於國際共運有好的影響。(2)此後蘇聯的模式不能再強迫的推行至每一個國家中去。各個國家的共產主義者必須沿著他們自己國家的傳統與歷史條件發展自己的道路通往社會主義。(3)各國共黨繼續發展「自主路線」，不僅有利於共產主義運動，而且有利於在此運動中發展一個「多元中心」的國際共運。(4)對意共而言，避免史大林錯誤的最佳途徑就是走羣衆路線^{②1}。

緊接着蘇共廿大之後，就是一九五六年十月的波蘭暴動與匈牙利革命的悲劇。在這一連串的衝擊下，陶里亞蒂利用這絕好的

註^{①9} "Togliatti interview with *Nuovi argomenti*" ed. by D. Sassoon, *op. cit.*, pp. 115-119.

註^{②0} *Ibid.*, pp. 119-123.

註^{②1} *Ibid.*, pp. 141-142.

時機召開意共「八大」，清楚的標示出意共獨立自主的路線，成爲「歐共主義」的先行者。

意共「八大」的主要論題有：(1)檢討波蘭與匈牙利事件。意共認爲東歐國家在經濟發展與實現社會主義民主之間存在一些問題、弱點、甚至是很嚴重的錯誤。波蘭與匈牙利事件更顯示出每個國家必須發展自己的道路通往社會主義這個原則的正確性，違背此一原則必定帶來災難。(2)提倡一種新型的國際共黨關係。意共反對回到一個世界共產主義的中央組織，反對限制較小國家的統治權，或者向它的主權挑戰。意共提倡在相互尊敬以及建設性批評的基礎上建立國際共黨的雙邊關係，公開的討論當前的問題。(3)討論未來新的民主社會主義。意共主張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其他的勢力」將扮演一個「有用與進步」的角色。同時意共反對將數以千計的手工廠與小企業國有化，因爲他們看到在匈牙利與波蘭犯了如此愚昧的錯誤後所發生的事^②。以上這些論題都成爲日後「歐共主義」的藍本。

當陶里亞蒂於一九五六年六月發表談話以及於同年十二月召開意共「八大」之後，意共已經清楚的轉變了路線，而葛蘭西的理論在意共的發展中扮演了一個日益重要的角色。一九五七年陶里亞蒂召開意共「紀念葛蘭西逝世二十週年」大會。一九五八年他又召開「葛蘭西研究大會」。在這兩次會議上，他先以「葛蘭西的理論與實踐在今天的適切性」爲題，發表演講，後又發表「葛蘭西與列寧主義」的論文，正式爲葛蘭西的貢獻提出評價，並且主張意共日後依據葛蘭西的傳統來發展獨立自主的新路線^③。一九五九年在第三國際成立四十週年的前夕，陶里亞蒂發表「論第三國際的歷史」一文，全面而且澈底的檢討了國際共運的歷史經驗，也提出對自己過去錯誤的批評。陶里亞蒂指出第三國際成立的主要目的是譴責第二國際各社會黨背叛社會主義，並且恢復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然而第三國際在歐洲革命風暴的時代中，也使各共產黨革命犯了一些錯誤，其原因在於它沿着一條簡單的道路前進，缺乏在千變萬化的革命情勢中，適時的提出正確的革命路線；而且第三國際限制各共黨的領袖參與政情分析與決定政策，同時亦未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提出馬克思主義的分析^④。此外，陶里亞蒂具體的提出了從第三國際的一大到四大期間，歐洲共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失敗的原因：(1)歐洲社會民主黨墮落爲改良主義，不去改變現存的歐洲體制。因此共產黨從社會黨分裂出來是歷史必然的要求。同時這也就削弱了左派的力量。(2)社會民主黨與資產階級反動派聯盟，進行穩定資本主義。(3)歐洲強大的資產階級有力量挽救它的統治。(4)第三國際某些人不瞭解革命情勢，不知如何動員羣衆，擊潰資產階級。(5)雖然共產黨與社會黨分裂，但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尚未能除清，因此造成思想混淆。(6)歐洲無列寧主義的黨進行革命。陶

註^② See W. Leonhard, *op. cit.*, pp. 168-169.

註^③ 關於陶里亞蒂論述葛蘭西的觀點及其問題，請參閱拙著，「葛蘭西與列寧主義」臺北，「問題與研究」第廿卷第十一期，民國七十年八月。至於葛蘭西對「歐共主義」的影響另文撰述。

註^④ P. Togliatti "On the History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n D. Sassoon, ed. *op. cit.*, pp. 209-214.

里亞蒂亦指出第三國際從「四大」到「六大」期間的各種錯誤：(1)「四大」之後蘇共的派系鬭爭波及第三國際各共黨，造成嚴重的損害。(2)第三國際未能及時與全面的瞭解法西斯的威脅。(3)第三國際錯誤的把社會黨看成社會法西斯，忽略了社會黨與共產黨可以合作共同保衛民主制。(4)第三國際推展「以階級對抗階級」是錯誤的策略，這是宗派主義作祟。正確的策略應以廣泛的聯盟來對抗法西斯^②。依陶里亞蒂看來，只有第三國際「七大」「人民陣線」的路線是正確的，扭轉了國際共運的劣勢。陶里亞蒂還尖銳的向蘇共提出挑戰，認為蘇共「廿大」清算史大林的罪行中並未清算他指導第三國際時所犯各種錯誤^③。陶里亞蒂如此的檢討過去的負面經驗，開創「歐共主義」共黨自我批評與批評蘇聯的風氣。不揚棄布爾什維主義的遺毒，是無法開創出新出路的。

一九六〇年意共召開「九大」，會中提倡共產主義者與天主教世界達成一項瞭解。意共認為這是意大利的道路通往社會主義的一項先決條件^④。一九六二年，意共注視歐洲經濟共同體，倡言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存在可以視為一種生活的事實，同時可以發展歐洲經濟共同體民主化來取代目前獨佔性的整合^⑤。在提倡重建共產主義者與天主教徒的關係，以及提倡歐洲經濟共同體民主化的問題上，意共都是「歐共主義」的先行者。

一九六三年意共召開「十大」，陶里亞蒂在會中繼續強調其「逐步發展」的概念。他認為過渡到社會主義是必須在人民同意的基礎上來達成的，而這個過程需要逐步發展以及爭取意識形態的領導權^⑥。

六〇年代以來，在國際共運的發展史上出現了中共與蘇聯分裂的局面，蘇聯企圖召開世共大會來孤立中共。陶里亞蒂於一九六四年赴蘇聯參加世共大會籌備會，他在開會前夕起草了「雅爾達備忘錄」(The Yalta Memorandum)，却病逝於雅爾達。他的副手隆哥補充他的遺缺，成為意共總書記，並於同年九月發表了他的「雅爾達備忘錄」。這篇文稿強烈的影響了歐洲的共產主義者。其內容簡要的討論了：(1)中共與蘇聯衝突的問題；(2)國際共運的問題；(3)意共未來發展的問題。簡述如下：

(一)中共與蘇聯衝突的問題：陶里亞蒂認為攻擊中共的最佳途徑是：(1)關於基本原則問題不應與中共停止辯論，必須論戰到底；(2)譴責中共的方式必須針對具體的問題進行客觀的、具有說服力的討論，避免漫罵，同時保持對中共的尊重；(3)批評中共的立場必須從全球各地多角度的提出論證，不要單從蘇聯的立場討論問題，如此才能達到一個正確的看法；(4)以國際共運大會的方式

註^② *Ibid.*, pp. 220-232.

註^③ *Ibid.*, p. 214.

註^④ See. W. Leonard. *op. cit.*, pp. 171-172.

註^⑤ *Ibid.*, p. 172.

註^⑥ Hobsbawm/Napolitano Interview, *op. cit.*, p. 29.

來孤立中共時，團結國際共黨並不賴於一般性的譴責中共，而賴於根據世界各地的具體狀況提出一些更有深度的綱領來。因此，陶里亞蒂贊賞蘇聯簽署「禁止核子試爆條約」，贊賞赫魯曉夫訪問埃及等這些行動，認為這才是攻擊中共的有力措施。同時，陶里亞蒂以意共的作法爲例，來說明如何處理各共黨內的毛派份子問題：意共不以開除黨籍的手段來對付毛派份子，而以廣泛的討論來瓦解黨內毛派的勢力^⑤。

(二)國際共運的問題：陶里亞蒂主張各共黨發展自主路線，建立多元中心的國際共運等。同時他特別強調反帝國主義的問題，認爲資本主義已發展爲新殖民主義，必須與殖民地的國家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形成新的反帝共同綱領；也必須聯合中共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力量，共同進行反帝國主義鬭爭。陶里亞蒂亦指出當代社會主義陣營內的一些問題，如限制個人自由、限制民主的發展，有集權主義的傾向，史大林崇拜等^⑥。

(三)意共未來發展的問題：陶里亞蒂具體的指出意共未來發展的方向：(1)羣衆政黨與羣衆路線；(2)建立新的國際主義精神；(3)克服教條主義，對於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民主政治的發展等新的問題與環境，提出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與改革的途徑；(4)繼續與天主教徒對話，取消無神論的宣傳；(5)開放學術文化的自由討論與自由創作；(6)以和平的道路、意大利的道路通往社會主義^⑦。

三、結 語

陶里亞蒂所揭示的目標、方法與方向，可以說是「歐共主義」的萌芽。爾後意共在隆哥的领导下，繼續發展陶里亞蒂的路線，進一步發展「歐共主義」。總結陶里亞蒂從「薩連諾的轉向」到「雅爾達備忘錄」這廿年來路線的抉擇與發展，大致上以一九五六年意共「八大」爲分水嶺；前一階段是第三國際「七大」人民陣線的延續，後一階段是意共自主路線的逐步發展，形成「歐共主義」的先行者。誠如盧卡奇(G. Lukacs)的論斷：陶里亞蒂是個偉大的策略家。他的新路線使意共不斷壯大，成爲共產集團之外最強大的共黨。當陶里亞蒂逝世時，意共躍居意大利第二大黨，在一九六三年的全國大選中獲得二五·三％的選票。陶里亞蒂之所以能够準確的掌握歷史時機，靈活的調整策略，擴大政治勢力，應歸功於他的理論水平與文化教養，都高出蘇聯的教條主義。同時在陶里亞蒂的背後，蘇聯的神話還完整的保留下來，使他能够順利的推行他的新路線而不遭受蘇聯的懷疑與非難，避免意共與蘇共的分裂。克勞汀如此評價陶里亞蒂：

註⑤ P. Togliatti "The Yalta Memorandum" in D. Sassoon, ed. *op. cit.*, pp. 286-288.

註⑥ *Ibid.*, pp. 294-297.

註⑦ *Ibid.*, pp. 290-294.

「陶里亞蒂思想的形成以及他複雜的人格使得他很難接受史大林的模式。由於他個人高度的妥協能力以及高度的運作技巧，加以巧妙的運用他在第三國際的崇高地位，使得陶里亞蒂能够在臣屬蘇聯的領導並且亦照顧意大利形勢的特殊要求之間維持一種高度困難的平衡」^③。

筆者同意克勞汀對陶里亞蒂的評價，但是筆者要加以補充說道：陶里亞蒂的內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意大利共產主義運動能够充分的獨立自主，另一方面他又深知他的權力與聲望來自蘇聯，來自他與列寧、史大林相處所沾染的一種能使羣衆傾心的領袖特質（Charisma）。陶里亞蒂一生的活動與路線的抉擇，正是他內心矛盾的最佳寫照。至於說陶里亞蒂的新路線是否成功，有待未來的歷史來驗證。陶里亞蒂只能在黃泉路上來參與這項歷史的審判。

註③ F. Claudin *op. cit.*, p. 344.

共匪禍國史料彙編

本書第一、二、三冊，按時序先後編纂，紀述共黨自建黨至抗戰勝利之禍國罪行。第四冊起，改按專題編纂為「農村變亂」——「查田運動」，第五冊為「農村變亂」——「蘇維埃暴力分地」，第六冊為「農村變亂」——「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與武裝叛亂時期的清算鬭爭等」。

十六開本 六巨冊

工本費 新臺幣 一千六百八十元
美金 四十七元

郵資另加 國內：新臺幣四十二元
平寄美金 十五元
國外：航空美金 六十五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代售
限閱資料憑機關學校公函購用。